



川南“新文化运动”与恽代英的思想转折

——基于新旧双方互动的视角

李 哲

摘要:1920 年代川南的教育改革,由卢作孚、恽代英等一批知名新青年所发起,并一度成为西南地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一事件不仅是地方史上的重要议题,同时造成原本态度稳健的恽代英迅速转向武装革命道路。在此一过程中,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对手方”,当地的士绅群体对西学新知的开放态度,使得新文化传播成为可能。不过,随着改革事业的推进,新旧之间存在理念上的根本分歧逐渐显露,恽代英试图通过学生自治对抗士绅所推崇的礼教,终因政权更迭、校长撤换而导致学潮的爆发和士绅的强势反弹,促使其思想趋于激进、转向武装革命。

关键词:恽代英;川南“新文化运动”;新旧士绅;学生自治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3.02.023

收稿日期:2021-12-28

作者简介:李哲,男,陕西清涧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E-mail: 19110140007@fudan.edu.cn。

恽代英是中共早期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不仅是宣传新思想的理论家,同时也是持枪荷弹的政治活动家。既有研究较多关注恽代英作为革命者的经历与影响,而对他早年作为新文化人的思想变动讨论不够充分^①。这一点如果放置在地方文化演进的脉络中讨论,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新文化运动”的在地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话题,近年来涌现出不少新成果,不仅从地域上扩展了研究的视野,而且通过阅读、媒介、传播等视角以及“地方读书人”的发掘,向我们展现了“在地化”的复杂历程^②。本文所聚焦的空间是位于川南地区长江沿岸的小城泸县(清代为泸州直隶州,1913 年废州置县,泸县便作为了下川南道、后更名为永宁道的公署所在地)^③。1921 年,恽代英来到这里从事教育改革,一度使之成为西南地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城市。对于地方史而言,这一事件是具有纪念意义的浓重一笔^④。同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此一经历处于恽代英思想发生转折、继而加入共产党的关键时期,因此颇具讨论价值。

^①恽代英早年的思想资源非常复杂,值得作细致梳理。相关论述详参:邓军《“苦行嗟谁及”:恽代英与宋学的道德严格主义》,《开放时代》2012 年第 7 期,第 73—85 页;邓军《从“良心”到“主义”:恽代英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社团组织困境》,《中共党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第 69—78 页;马建标《五四时期恽代英国家观念的养成及其救国实践》,《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第 1—11 页。

^②张仲民《时代思潮的地方回应——舒新城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民国研究》2009 年第 2 期,第 162—183 页;瞿骏《新文化运动的“下行”——以江浙地方读书人的反应为中心》,《思想史》第 6 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16 年版,第 48—87 页;瞿骏《老新党与新文化:五四大风笼罩下的地方读书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 期,第 79—97 页;徐佳贵《“五四”与“新文化”如何地方化——以民初温州地方知识人及刊物为视角》,《近代史研究》2018 年第 6 期,第 43—58 页;瞿骏《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109—119 页;徐佳贵《湖畔风云:经亨颐与浙江五四新文化运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第 33—53 页,第 3 期,第 33—55 页。

^③本文当中涉及到地名表述时,时间限定在 1913 年以前用“泸州”,1913 年之后用“泸县”,不便以时间判定则可能两者混用。

^④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这一话题便得到不少地方史及地方文史资料的关注,主要有:张至皋《恽代英同志在泸州》,《社会科学研究》1980 年第 1 期,第 63—70 页;何伯李《泸州川南师范史话》,《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33 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0—174 页;中共泸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印《恽代英在泸州》,1987 年;等等。

有研究认为,从五四运动到1921年年末,恽代英“从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①;也有学者指出,“正是在经历了四川教育的失利后,恽代英转而投向更广阔的革命生涯中”^②;大致是他在泸县的一年多时间里,其态度从稳健乐观急剧转变到暴力革命,已有论作对他在川南师范学校的校务改革实践和教育思想转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发掘“新文化的对手方”,即泸县地方士绅的资料,希望从新旧双方互动的视角当中理解恽代英思想转折的轨迹。

一 清末民初的社会革新

张灏将1895—1920年初前后大约25年时间视为“转型时代”,认为“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④;王德威更从文学研究出发,提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⑤的看法。这些观点无不提示我们,要以较为长程的视野,重新认识晚清与五四之间断裂与延续关系的价值和意义。

清末新政时期,泸州的社会风气已非一味尊经复古,反而较为趋新,而当地士绅在此一变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97年中举的高觀光,早年“研制艺,举于乡”,后“北上燕都,见天下乱已兆,非变法不足纾国患”,回到家乡从事教育事业,态度大为转变,“倡新学说,举天算舆地汽化声光电矿博物各书籍,无不购置,船路邮电各新政、万国公法、中外条约,无不讲求,女学天足,及各实业,无不提倡”^⑥。泸州士绅对于西学新知秉持开放态度,倡导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社会改良,以致在晚清时当地已渐次发展起邮传、电报、学堂等新事业。

1901年,泸州知州沈秉堃与在籍士绅高楷、周善培等人商请永宁道道尹黄立鳌,集资创建川南经纬学堂(后改名为川南师范学堂),聘请四川大儒赵熙担任首任监督,“本中国先王之典,参以外国今行之法,屹然众志一新”^⑦。该校自创办起便注重“中西并驾”,“先湛经典以固其基,而后采掇欧美以恢其用”^⑧,企求“开全蜀之风气,为列郡所矜式”^⑨。赵熙去职后,泸州本地士绅高楷、温筱泉、陈铸等人先后担任监督^⑩。清末几年间,学堂内成立“输新社”,鼓吹革命思想,不少学社成员都是同盟会会员,社长陈宝镛便是学堂监督陈铸的儿子。1908年,泸州劝学陈铸在劝学所内开设阅报所,旨在“化处固闭,通达外情,对镜返观,以求改良社会之习惯”^⑪。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士绅温筱泉和陈铸成立女学会,温出资担任董事,陈负责办学并任监督,设立女子高初两级小学,次年扩展为川南女子师范传习所^⑫。可见,从清末新政开始,曾经历过科举教育的士绅群体,成为了主导当地社会变革的力量。

民国建立之后,泸县恰好处于南北政府交战的拉锯地带,政治局势变动不安,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如论者所言,“民国以来,泸地繁富,当川滇黔三省冲要,事多故矣”^⑬。除了教育领域以外,当地士绅多致力于团防、慈善等事业,更加强调传统学说,以维持社会和人心稳定为己任。1914年夏,泸县中学教员高觀光

①李良明《恽代英全集》的编纂与价值,谢守成主编《纪念恽代英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

②张晓宁、孙泽学《1921—1923年恽代英在川南师范的活动及其影响》,谢守成主编《纪念恽代英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54页。

③凌兴珍《由改良到改造:五四前后恽代英教育思想变迁轨迹——兼论其对1921—1922年川南师范学校校务改革的贡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2期,第227—234页。

④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年4月号,第29—39页。

⑤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9页。

⑥鲁有章《序》,高觀光《菰湖余碧录》卷1,泸县文源印刷社1935年版,第5页。

⑦赵熙《川南学堂记》,王仲辅主编《赵熙集》下,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1页。

⑧赵熙《川南师范学生五年毕业训词》,《广益丛报》1909年第192期,纪闻第14a页。

⑨赵熙《川南师范学堂开学监督赵观察演说》,《广益丛报》1906年第110期,纪闻第9a页。

⑩王禄昌等修、高觀光等纂《泸县志》卷4《教育志·教育机关》,民国27年(1938)铅印,第13b—14a页。按:高楷、陈铸、温筱泉分别于1875、1894、1900年中举。

⑪《泸州劝学所附设阅报所简章》,《广益丛报》1908年第173期,纪闻第9a版。

⑫《泸县志》卷4《教育志·教育机关》,第14a页。

⑬高觀光《温小泉耆年赠言》,高觀光《菰湖余碧录》卷1,第94页。

就认为,“报功崇德,崇尚礼教,非吾泸今日士大夫之责欤?”^①同样,高觀光的好友、举人李赦虎,在民初“益以著书传道,自任其于道家”^②。另一位士绅亦提出“时宜救乱风,道在崇正学”,“救时无异策,三礼亟须温”^③。不仅如此,1918年,当地新修孔庙,碑记云:“试观里塾之间,教师有不遵孔教者,则其父老子弟,绝不从学焉。岂非孔圣之道,自在人心,虽有异说,不能乱之哉。”^④体现出民间社会对于孔孟之道的心理认同。

1920年,在新任永宁道道尹杨森的倡导下,一场更大规模的“新政”在川南地区展开。以泸县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便属于“川南新政”的一部分。杨森本是川人,后追随蔡锷参加护国战争,成为滇军中的团长,护国军一路北进,占领泸县、自流井、成都等地,迫使袁世凯终结帝制。然而,功成之后的滇军,一直盘踞川南,引起了川军的不满。1920年,驱滇战役爆发,杨森顺势倒戈,帮助川军战胜滇军,由此升任师长,驻军泸县,并兼任永宁道道尹。这是他首次担任重要地方长官,时年36岁。在后来的回忆中,他写道:“就在这一年,我的职衔是川军第九师师长,兼任川南道尹。我的根据地是泸州,因此我经营川南的目标是整军修文,齐头并进。”^⑤

此时,杨森的势力范围集中在川南,甚至一度控制了四川最为富庶的自流井。他主持的川南新政,先从改建军事学校开始,将云南讲武堂泸州分校改为泸州第九师讲武堂,目的在于吸引青年,培养军官,训练军队。同时,他着手开展了一系列市政建设。比如他主持兴筑泸县南门外至山岩脑的马路,此在四川交通史上尚属首创;在县城内,他命令整顿市容,拆除旧屋,扩宽街道,铺上石灰和桐油,以利商业发展;在县城外围扩大造林,特别是忠山一带,改造了原有坟地,鼓励植树活动,“二三年间,森林翳翳成荫,多至二、三十万株”^⑥。此外,他还聘请留德学生税西恒担任道尹公署建设科长,筹备水力发电项目^⑦。在晚年,杨森回忆:“余之施政,行新政,用新人,旧染污俗,咸与维新,诸如市政之倡办,马路之开筑,造林之扩大,资源之开发等,莫不力求进步向上,在政治建设作重大之革新。”^⑧

杨森对于“新人”青睐有加。有传言说:“其用人也,喜欢用一般持手杖穿洋服的青年,只要说是何处毕业,便可立地收入夹袋。”^⑨川南新政也的确吸引了一批青年。在一次民政会议上,江安中学数学教员卢作孚向他递交了一份万言书,讲述一切政治改革应从教育入手,以教育统治人心为基本准则,强调“事得人而能举,无人才即不能发生力量”,建议道尹公署设立专门机构,延揽各种人才。卢作孚的这一想法得到杨森的认同,卢本人则被杨森直接任用为道尹公署教育科员,不久便升任为科长^⑩。

卢作孚曾在成都担任《川报》总编辑,接触到不少新思想,五四运动前后在四川舆论界崭露头角。在好朋友陈愚生的帮助下,卢作孚利用少年中国学会人际关系网络,先后邀请到了王德熙、恽代英等多名学会成员来泸县开展“新教育”,通过创办通俗教育会、图书馆、演讲所、平民夜校等开展民众教育活动,并且大力整顿川南师范学校教育。在此过程中,川南师范学校成为教育改革的中心,恽代英则在其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⑪。

杨森所主导的川南新政雷厉风行,据他后来回忆,“川南一带变成了全四川文化教育的中心,隐隐取代重庆、成都的地位”,并认为这是“史无前例”之举^⑫。不过,该事件前后的川南地方人士,特别是士绅群体,似乎隐没成为“失语者”,或单纯以“封建遗老”形象出现。事实上,泸县教育领域的变革并非线性的新派挑战、驱

①高觀光《重游云谷洞记》,高觀光《此湖余碧录》卷1,第84页。

②《泸县志》卷6《人物志·文苑》,第51b页。

③苏启元《移居杂诗》、《山居杂诗》,苏启元《苏山诗草》卷9,泸县鸿文石印局1926年版,第23b、13b页。

④高觀光《焦滩新场孔子庙碑记》,高觀光《此湖余碧录》卷1,第105页。

⑤杨森《滇风蜀雨》,朱传誉主编《杨森传记资料》第3册,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70a页。

⑥杨森《九十忆往》,台湾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49页。

⑦罗才荣《“望将军早日‘开车’”——纪念杨森将军》,朱传誉主编《杨森传记资料》第3册,第19b页。

⑧杨森《九十忆往》,自序,第3页。

⑨《成都通信,杨邓交恶之由来》,《申报》1924年9月3日,第5版。

⑩杨森《滇风蜀雨》,朱传誉主编《杨森传记资料》第3册,第72b—73a页。

⑪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1页。

⑫杨森《滇风蜀雨》,朱传誉主编《杨森传记资料》第3册,第73b页。

逐旧派的过程,新旧派二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并对恽代英的思想转变带来了极其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二 新旧合作下的新文化运动

作为当地社会的“代言”群体,泸县士绅的思想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对于西学新知并非完全排斥,甚至在晚清时他们就是传播西学的先锋,其开放的态度使得恽代英等人来川南从事新文化输入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他们又坚持以维护社会秩序为本,特别是在民初动荡的时局中,强调礼教对于安定社会人心的作用,由此埋下了新旧双方分道扬镳的伏笔。

1921年夏,卢作孚通过少年中国学会邀请到王德熙、恽代英等多位会员来泸县川南师范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王德熙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据时任川南师范附属小学教员胡兰畦回忆称,他头梳拿破仑式短发,“西装毕挺,皮鞋透亮,手杖一甩一甩地”,“简直是位翩翩公子”^①。除他之外,学校里“新来的教师不是西装,也是短服,全无马褂长袍;不但衣着出色,还有许多洋装书”^②。在恽代英到校之前,校内师生已有耳闻,觉得他“一定也是西装革履,一定也有许多洋装书”,然而当他出现之后,却使人“有点失望”,因为他“穿一件蓝布长衫,但已洗得看不见蓝色了;袜子无袜带,在脚颈缩作一团”,总的印象是“其貌不扬、衣着土气”^③,甚至有学生觉得他“一点没有‘新青年’气派”,误将其当作恽代英的仆人^④。同样,据胡兰畦回忆,第一次在泸县见到恽代英时,觉得“他看上去象个乡下人,光着头,但鼻梁上却架了一副光边的高度近视眼镜,身上穿了一件褪了色的葱白洋布长衫”,说话也是“满口湖北腔”^⑤,其形象与人们的预期不太相符。

不仅外形土气,事实上,五四运动前后的恽代英并非激进人士^⑥。1919年5月,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他谈到:“代英每疑与旧势力不必过于直接作敌。一则所谓新人物不尽有完全之新修养,故旧势力即完全推倒,新人物仍无起而代之之能力。一若用稍委曲之方法,旧势力既不生反感,虽全盘与之推翻,亦不知觉。一如以孔子之道治自命孔子之徒,比用直接之方法,成效远优。”^⑦罗志田已经注意到恽代英早期的思想动态,并认为“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卓识”,然而,“持这样稳健观念的人,竟然不久就成为身与武装革命的领袖,可知边缘知识青年行动起来之后,其激进是远过于其老师辈的”^⑧。

此时的恽代英虽然已经开始接触、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书籍,但对于思想上新旧之间的合作仍持稳健乐观的态度,甚至认为双方可以互相帮助并趋向于一致。事实上,他在泸县开展的新文化实践,起初即是在这种新旧合作的理念下进行的,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暴露出双方的隔阂无法消弭,促使他走上激进的道路。

在恽代英到校之前,卢作孚和王德熙对整顿校务已有初步的举措,包括增加经费投入、聘请新式教师、废除学监制度、成立学生自治会等内容^⑨。1921年10月,刚到校的恽代英,写信给好友称,“他们仰望我定全校教育标准”,“该校比较或尚有改造之望”,因此力邀好友杨效春来校任教^⑩。在他的想法里,川南师范不仅要学生“单纯养成小学老师”,同时要培养其为“社会运动家”^⑪。因此,他持续开展学校革新运动,如改革行

①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

②钟心见《碎忆恽师》,《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67页。

③钟心见《碎忆恽师》,《回忆恽代英》,第167—168页。

④张济民《忆恽代英同志在川南师范》,《回忆恽代英》,第261页。

⑤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第40—41页。

⑥章清从阅读的角度揭示出,比起学术内容,恽代英对于行动更感兴趣。参见: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54—72页。

⑦恽代英《致胡适》(1919年5月19日),《恽代英全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卷,第24页。

⑧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188—189页。

⑨详参:凌兴珍《由改良到改造:五四前后恽代英教育思想变迁轨迹——兼论其对1921—1922年川南师范学校校务改革的贡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2期,第227—234页;王果《存天下于一方:卢作孚的人生格局与济世道路》,罗志田、徐秀丽、李德英主编《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2—368页。

⑩恽代英《致杨效春》(1921年11月),《恽代英全集》第4卷,第527—530页。

⑪恽代英《致杨钟健》(1921年11月),《恽代英全集》第4卷,第533页。

政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推荐萧楚女、李求实、谢啸仙等人来校任教。除革新校务外,他还积极推进社会教育活动,在杨森和卢作孚的支持下创办起图书馆、讲演所和平民夜课学校等。

图书馆和讲演所均设在县城中心的治平寺内。治平寺又名白塔寺,因寺内的白色报恩塔而出名,是当时泸县城内最高的建筑^①。据时人回忆称,当时泸县图书馆订购的图书报刊约10万余册,每天到馆有四五百人,除了传统典籍《四库全书选辑》等书外,馆藏有欧美及国内出版的科学读物、文学作品,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的著作以及《新青年》、《新潮》、《觉悟》、《创造》、《小说月报》等刊物,青年学生成为光顾图书馆的主力^②。

与此同时,又将在治平寺内原有戏楼粉刷修整,布置成一间大教室,作为通俗演讲所,室外悬挂“泸县通俗演讲所”木牌,每周日晚六到十点,不分新派、旧派,聘请学校老师做专题演讲^③。因为白塔的位置特殊,图书馆和讲演所的开办,吸引了一般民众前来阅读与听讲,尤其是讲演所,县志称其“轮夜欢迎城内学者登台讲演,收效颇宏”^④。

治平寺白塔最初由南宋泸南安抚使冯穉为报母恩而建,象征着儒、佛所共享的孝道价值观^⑤。它作为泸县城内最高的建筑,一直延续到1928年西式的哥特式建筑钟鼓楼落成。从建筑空间而言,图书馆和演讲所的修建,一定程度上是“寓新于旧”,象征着新旧观念的合作与碰撞。

根据当时《泸中校刊》编辑易润生回忆,演讲的教师不分新旧,常常就同一话题展开讨论。当时演讲次数最多的是萧楚女和李敖虎。李敖虎于1920年开始担任泸县教育会会长,兼任泸县中学教师,在民间有“李大圣人”之称,与前述陈铸、高颀光等人同属士绅圈子,相互间有“德性、学问、文章、事业”之交^⑥。至于演讲的内容,也是新旧观点兼容并包的。比如有一次,萧楚女和李敖虎同讲“温故而知新”这一题目,李敖虎的论点是“要先温故才能知新”,萧楚女则认为“知新不是以温故为前提,只能把温故作为知新的参考”,除此而外,还有别的老师登台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一个题目演讲往往要持续数晚。又有一次,恽代英讲“青年应树立进步、科学的精神”,李敖虎则针锋相对,认为“致知在格物”,“科学并非欧美所发明,而是中国固有的产物”^⑦。还有一次,萧楚女讲“中国文化科学落后的原因”,指出封建主义如何束缚,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随后,李敖虎也讲这个题目,引经据典,观点则完全不一样^⑧。

校园课堂上新老教师兼容授课、图书馆所购的书籍古今并存以及讲演所中两派争辩的场景,皆体现了新旧双方合作的意愿和努力。士绅陶开永称赞道尹杨森为“今日文翁”,并颂诗一首:“新潮澎湃撼五洲,东西信仰同时休。马克思与尼山邱,孰居劣败孰果优……昌阳豨苓一囊收,斟酌古今涵众流。”^⑨不论是学校革新,还是社会教育,泸县的“新文化运动”基本体现了新旧相维、同台竞技,甚至存在互相争夺受众、争夺主动权的局面。新事业在杨森的支持下,开展得较为顺利,恽代英非常兴奋,致信好友,讲述自己的办学计划,并称“川南以改造教育、改造社会或竟闹得成功,此不能说非‘利用已成势力’”^⑩。然而,随着意在鼓动青年人冲破纲常束缚的自由、平等新价值观念的宣扬流行,以及白话文在学生之间的传播,旧势力的反应却超出了此前他乐观的预料。

三 新旧潮流激荡搏击与恽代英的思想转折

士绅李敖虎观察到,“今世学子,荒经蔑古,心粗气浮,薄其父兄师长,而自诩开通,而为之师者,半新自学

①申虹云《古刹遗址上的博物馆》,胡尚炯等编著《名城泸州——泸州乡土纪实散文选》,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②易润生《恽代英、萧楚女在泸州》,《易润生文选》,泸州市政协1990年编印,第127—128页;毛鸿开《泸州新文化事业的创新》,《毛鸿开诗文集》,泸州市市中区政协文史委1991年编印,第56页。

③毛鸿开《泸州新文化事业的创新》,《毛鸿开诗文集》,第55—58页。吴孟辉则说演讲所是每周一、三、五晚上开讲。参见:吴孟辉《名人与泸州》,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

④《泸县志》卷4《教育志·教育机关》,第20a页。

⑤胡昭曦《冯榘与泸州报恩塔》,《四川文物》2004年第2期,第65—69页。

⑥高颀光《温小泉耆年赠言》,高颀光《苕湖余碧录》卷2,第93页。

⑦易润生《恽代英、萧楚女在泸州》,《易润生文选》,第128—130页。

⑧吴孟辉《名人与泸州》,第151页。

⑨陶开永《寿杨子惠督理》,《仪顾堂诗集》,1935年铅印,第17a页。

⑩恽代英《致杨钟健》(1921年11月),《恽代英全集》第4卷,第534页。

子中来,年相若,道相似,不足起其严惮,遂不免过自谦让,以冀优容……以增长其傲慢,而学风由是日蹙。”^①当时教育科长卢作孚 28 岁,川南师范学校的教师中,恽代英 26 岁、萧楚女 30 岁,其他人也都是二三十岁,与一般学生确实年龄相仿^②。在李敖虎看来,卢科长及恽、萧等老师都年纪太轻,师道尊严不足,纵容青年学生的年轻气盛,只会使学风日趋浮躁。

除李敖虎外,高颢光对新式教育方式也产生质疑。他认为,“世之才智之士,乃倡言放纵,谓所以养子弟之性灵。秉礼教者,则以为拘禁焉,鄙其腐败而诋其无用。吾恐其以爱子弟者害子弟,且以乱天下也”^③。在他的经验里,传统礼教影响下的社会风气颇为良好,但是“近世俗浇薄,竟言权利,骨肉至攘放仇杀,天下以大乱,不可救止,孝友睦姻任恤之风,与言利之效,可以见矣”^④。相较之下,时下的潮流可能会引起纷乱不止的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说:“自由持论君何若,平等观人我尚疑。”^⑤在与温筱泉的唱酬往来中,他讲道:“冤亲平等如来愿,物我胥忘太上情。世界大同同此否,欲留老眼看澄清。”^⑥他所理解的平等,与佛教讲“冤亲平等”相类,显然与新派提倡的“平等”意义不尽相同,因此对于“平等”持反对态度。

不仅泸县士绅理解的自由、平等与新派不同,以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四川各地大致如此。如涪陵县在民国初立时,“乡人无知,误解平等、自由,以为无法无纪,抢劫捉搵之案层见叠出”^⑦;合川县有“近复民国成立,事事维新,无人不有自由平等思想,礼义有不必讲,廉耻有不必存,无富无贫,惟奢之一字是尚,实为风俗之忧”^⑧。一般民众误解自由、平等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而在士绅看来,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的宣扬,只会导致世风日下,无益于稳定世道人心。

此外,李敖虎对新派所提倡的废除三纲五常展开批判,认为他们“逆天悖理”,“是生人生物之初,舍上下则不可为生,不可为人,而并不可为物,乌容有平权自由之说得厕其间哉?而世乃有废三纲、废伦纪之人,岂其性与人殊欤?抑其受生之际有大反乎常道者欤?不然何所见之逆天悖理,一闻尊亲上下之说,至欲沉渊洗耳以避之也”^⑨。显然,士绅所提倡的“尊亲上下之说”,与新青年的“废三纲、废伦纪”,可谓水火不能相容。

至于新派提倡舍文言而用白话,更让士绅觉得难以接受。诗文关乎礼仪、教化乃至政治。在高颢光看来,清末废诗文、变科举不仅使文学堕落,科学亦未尝发达,失败的教训殷鉴不远;民国以来,“以白话无声韵格律者,谓之诗文,倡之国内,思以易天下之风尚,新学者之知识,而便后生之趋步,意非不善也”,体现出他尚能对普及白话文致以同情之理解,然而,“卒之论事情,则累幅而不能尽达;说理解,则词费而不能通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诗则更不足以感人心而神其鼓舞,不亦大可慨哉”^⑩，“至以无音律之俚语,传之其人,播诸国内,演为诗教,诋古诗文不足学,而并及于旧道德,同人病焉,相与提倡复古”^⑪。在古诗文被排斥、旧道德不足法式的挑战下,士绅同人可谓痛心疾首,更刺激他们大力提倡复古。

在这一背景下,恽代英不得不改变策略。1922 年 2 月,他写文章提倡学生自治,认为当下是“新旧潮流激荡搏击的时候”,“现今社会恶劣势力还很雄厚,一个较好的学校,若只三、五个教职员露着脸的向社会挑战,易于为宵小所乘。所以学生自治,是要学生自决。学生自决,亦是学生所以自卫的法子”^⑫。虽然学生自治是恽代英本人早已有之的计划,但这一番陈述却道出了其实际遭遇。因此,他主张,必须发动学生起来向社会“恶势力”决裂,并尝试挑战“恶势力”。4 月,原校长去职,恽代英升任校长,进一步开展“学校公有运动”

①李敖虎《原学补》,第 2a 页,李敖虎《声白集初编》,泸县文升石印局 1928 年版。按:该书没有统编页码,只有篇页码,特此说明。

②《川南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教员一览表》,泸州市档案馆:民国泸县立中学档案,档号 020/01/12,第 13 页。

③高颢光《礼论》,高颢光《此湖余碧录》卷 1,第 41 页。

④高颢光《张常安传》,高颢光《此湖余碧录》卷 2,第 28 页。

⑤高颢光《寄张光斗》,高颢光《此湖余碧录》卷 4,第 86 页。

⑥高颢光《前诗已寄重有感想仍韵奉上》,高颢光《此湖余碧录》卷 5,第 9 页。

⑦王鉴清等修、施纪云等纂《涪陵县续修涪州志·民国纪事》,民国十七年(1928)铅印,第 2b 页。

⑧郑贤书等修、张森楷等纂《新修合川县志》卷 35《风俗》,民国十年(1921)刻本,第 1a—b 页。

⑨李敖虎《造端夫妇说》,第 2a 页,李敖虎《声白集初编》。

⑩高颢光《杨葆华茹蕙斋诗文集序》,高颢光《此湖余碧录》卷 1,第 53—54 页。

⑪高颢光《陶仲渊诗文集序》,高颢光《此湖余碧录》卷 1,第 52 页。

⑫恽代英《我对于学生自治问题的意见》(1922 年 2 月 1 日),《恽代英全集》第 5 卷,第 2—3 页。

和“择师运动”。由此,新旧之间的搏击互动进入到了激烈的层面。

恽代英指出,“我以为学生自治是学生互治,即是说由教职员的独治,而求一种解放的意思”^①。在他的计划中,解放学生,改变过去教职员对学生的束缚与压制,既便于新思想、新文化在青年学生间传播,又有利于公民的养成。他还提出了实行学校公有运动,即校务计划、校款使用均由校务会议决定,择师活动的开展办法是每学期结束前,学生对教职员进行无记名投票,有三分之二以上赞成不续聘的,即不续聘^②。总之,赋予学生权力,让学生参与到校务运作中来,甚至可以决定教师的人选,这一举动不可不谓为激进。

作为校长的恽代英,力主学生自治,在李敖虎看来,这已不仅是离经叛道那么简单的事情,“报章载某志士之言曰,学校管教诸员与雇员杂役,皆为有学生而始得衣食。是学生者,学校之主人翁也。主翁与余人不协,将孰为去留乎?”他气愤地认为,“以若所云,不自知为被造之材,木不受揉斫剝于工师,如庄生所云,臃肿不中规矩,拳曲不中绳墨,反执其臃肿拳曲者以裁定规矩绳墨也……至同时志士,又皆不可一世,虽互相赞许,要皆假合济乱,常伏其相遏灭之机势,以冀伸其鞭笞一世、无所餍足之野心……饰为解放之说,破坏一切以便其大吻之吸收,然后缚束之,驰骤之,俾各牺牲其性命以偿吾意之一快,而贸者且乐闻而感戴之。夫帚解放则无帚,桶解放则无桶,舟车解放则无舟车,宫室解放则无宫室,肢体解放则凌迟寸磔。”^③

对所谓“解放”一说,李敖虎深表疑虑,并大胆预言破坏一切只能导致流血牺牲,“今欲厘振学风,必先恢复读经,以弟子职附孝经后,俾知事亲事师之道,而践之以实行,以为事上事……即以责之学子课业,以人事父兄、出事师长为主要,而余课特其应用之条件,主要或疏,则其余不足观也。……学为奴隶,为斯民应尽之天职”^④。

新派力求解放,旧派则称学为奴隶是应尽天职,并认为人事父兄、出事师长是为学最重要的课业。双方各执一词,不仅寸步不让,反而互相排斥诋毁,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况。士绅陶开永有诗描述道:“泮林环列千貔貅,欲将章甫换兜鍪。”^⑤“章甫”指儒者之冠帽,“兜鍪”则是战士的头盔,由此可见,双方之间的气氛已从“文争”变为“武斗”,枕戈待旦,一触即发。

作为接受方的学生而言,其思想和见识变得纷繁复杂。据卢作孚后来回忆,“川南的教育变革,各种思想涌进了川南师范”^⑥。1922年5月,恽代英先后组织学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S. Y.),通过定期举办读书会,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⑦。也有一些学生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自诩安那其主义者,在校园里办板报、编报纸,宣传安那其主义^⑧;并向学校要求把公费领回家去自修课程,期满回校毕业^⑨。还有人回忆称,同学每人领有一本《杜威五大讲演》,“不管阅读的进程如何,却也知道‘教育即生活’的道理”,并称当时长期订阅的是《小说月报》及文学研究会的丛书,尤以冰心和泰戈尔的诗集最受欢迎^⑩。

总之,新思潮的涌入,造成新旧之间、青年人同老年人之间的间隙日深。李敖虎称,“新学小生,自诩开明,其言状棘耳刺目,其易地相视,且有加无不及,有语以先世言行者,引去唯恐不速,欲沉渊洗耳以避之,似厌其人老而不死,不可并居一世,以借抒其平日疾视亲长之愤者。”^⑪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青年人与老年人相接触的场景,不仅唯恐避之不及,更厌恶与之分享世界。可见,新旧之间,特别是以恽代英为首的新派与旧派之间撕裂程度越来越深,变得不可弥合。

1922年6月,恽代英在《少年中国》发表文章称,“不倚赖旧势力以建设事业的觉悟还要更深切啊!”他说

①恽代英《我对于学生自治问题的意见》(1922年2月1日),《恽代英全集》第5卷,第5页。

②恽代英《川南师范的学校公有运动》,《中华教育界》1922年第11卷第11期,第6页。

③李敖虎《原学补》,第3b-4a页,李敖虎《声白集初编》。

④李敖虎《原学结论》,第1a页,李敖虎《声白集初编》。

⑤陶开永《寿杨子惠督理》,陶开永《仪顾堂诗集》,第17a页。

⑥卢作孚《自述》,《卢作孚全集》第3卷,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1396页。

⑦李元杰《追忆代英》,《回忆恽代英》,第93-94页。

⑧王绿萍《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1987-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

⑨阴懋德主编《泸州市志》手稿,1959年,第56页。

⑩毛一波《川南师校杂忆》,《四川文献》1972年第124期,第19-20页。

⑪李敖虎《汤先生遗稿书后》,第1b页,李敖虎《声白集初编》。

办市政、办实业、办交通事业,“民众所能受其福利者几何”?教育事业也是一样,“能受教育的多只系富贵人家的子弟,而所受教育,又常系私利的、服从的、保守的性质”,并认为“旧社会的罪恶,全是不良的经济制度所构成。舍改造经济制度,无由改造社会”,此时他已自觉倾向于使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来分析和解决问题,认为在旧社会“这样不合理的理想的环境中,想在一局部做成什么理想事业,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发出了“要改造须全部改造”的呼声^①。此时,他已放弃了局部改良的事业,而主张谋求全部的改造,其所谓的“改造”即是革命。

这一年暑假,恽代英前往上海购买教学器材和设备。9月,川军赖心辉部击败杨森并占领泸县,委任张英为永宁道道尹。杨森被赶走之后,改革事业顿时停滞。随后,张英宣布更换川南师范学校校长。此举激起了学生学潮,学生提出了“学校公有”的口号,并以罢课相要挟,宣称“我们已向(向)道署提出正式要求,以后无论何人委的校长,都不能承认,非达到目的一日,即全体罢课,为学校公有运动一日”^②。不久,回到泸县的恽代英,被张英扣押,几经周旋后,获得保释。出狱后的恽代英,称:“尤其感激川南师范一般可敬爱的真挚青年,这种扣留虽不算一回什么事,却赢得了这些浓厚的同情,比平时稳稳的学校讲演,功效大了十倍。”^③

新履职的道尹张英,支持传统学说,反对“赤化”。在他1922年生日时,高颢光称赞他“严以驭军,宽以治民,诚以绥匪,道德以教士”,由此可推测官绅之间的观念大致相合;高还回忆起张英治泸之始,“事纷而无纪,人厪而语杂,莽戎潜伏,势岌岌不可终日,人民惶惧,莫之所措,又恐继任者年少喜事……或提倡自由平等,有关于人心风俗之盛衰,而公则一以平心处之……军民协和,群吏奉法,奸宄敛迹,庶政聿修”^④。声言张英虽然年纪不大,但却治理有度,政通人和,从侧面揭示了士绅对于前任道尹杨森颇有微词。

川南师范的学潮虽以恽代英被保释出狱而暂告平息,但是学生活动依然踊跃不止,尤其试图在校长人选和师资选聘问题上争夺主动权。不久,署名为“川南二十五属代表及川南师范委员会”发表公启称,为打击学生“嚣风”,请求斥退闹事学生,驱逐恽代英出省^⑤。在张英和士绅的联合压迫下,卢作孚、恽代英等人不得不先后离开泸县。

这次挫折使得恽代英在思想上逐渐转向以暴力的方式解决新旧之争。在总结川南师范学校工作时,他提出:“今欲摧毁扑灭恶势力,非有比恶势力更大的力量,以加于他的上面,能够有成功的希望么?”此时对于恶势力,已经不再是温和地利用、合作、讲道理,只能以“摧毁扑灭”的方式相对待,“我们不仅将使学生成为敢战的军队,而且要使一般受侮辱剥夺的农人、工人、商人乃至一切市民,亦要一齐成为与学生共同作战的军队。我们的军队人数越多,力量便越雄厚,打倒恶势力便越有把握”^⑥。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回顾这一年多来的实践,“没有计划的讲演,没有目的的办平民学校,枝枝节节的为学校为地方所做的事情,我们不能盼望在全部未改造以前,能为局部争一个什么程度的改造……我们最要亟求有个全部改造”^⑦,包括男子废姓、女子剪发、做新诗小说在内的局部改造都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要实行全部改造。随后,他提出收拾时局的建议:“我以为最切实的收拾时局方法,是用一种武力,推行有条件的县自治。使人民既免于官吏武人之毒,而又不为绅阀政客所卖。”^⑧可见,他思想上已经倾向武装革命,希望以战争方式击败恶势力。1923年,共青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创刊,作为该刊主编,恽代英先后发表多篇宏文,持续为革命活动动员造势。

1926年5月,恽代英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同时兼任军校中共党团书记。他脱下褪色的长衫,换上崭新的军装,此后便以“无产阶级战士”自居,甚至在次年的婚礼上婉拒了岳父的建议,依旧穿着军装,并斜佩武装带^⑨。从长衫到军装的转变,体现着一个革命青年心理的外在延伸。泸县实践的失败,促使其从一

①恽代英《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进一解》,《少年中国》1922年第3卷第11期,第18—24页。

②《川南师范学生第二次宣言》,《京报》1922年9月22日,第6版。

③中共泸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印《恽代英在泸州》,第74页。

④高颢光《张挺生道尹四十初度序》,高颢光《苕湖余碧录》卷2,第85—87页。

⑤《川省之政局与学潮》,《时报》1922年11月14日,第3版。

⑥恽代英《学生的社会活动》,《学生杂志》1923年第10卷第2号,第2、5页。

⑦恽代英《学生与民权运动》,《学生杂志》1923年第10卷第5号,第6页。

⑧恽代英《收拾时局的一个提议》,《少年中国》1923年第4卷第3期,第1页。

⑨沈葆英《和代英共命运的岁月》,《回忆恽代英》,第41—42页。

个谋求合作的知识青年,逐渐转变为武装革命的宣传家和实践者。

四 结论:从新旧合作改良到武装革命

自晚清开始,曾经历过科举教育的士绅群体,成为主导泸州社会革新的力量。在民初的战乱环境当中,他们又以维护秩序稳定为己任。1920年,新任道尹杨森掀起“川南新政”,这一改革涉及到市政、实业、教育等多个方面,是一场区域范围内全方位的变革尝试,恽代英所参与的“新文化运动”便属于其中的重要一部分。杨森雷厉风行的态度,加上卢作孚、恽代英等新青年的满腔热情,使得它在短期内获得了可喜的成效。

在此过程中,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言群体,士绅并非一味因循守旧,而是强调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实行渐变。正是有他们的存在,泸县的士风在四川尚属趋新,这也成为双方可以合作的基础,因此在开办图书馆、演讲所等环节进展非常顺利。不过,随着改革事业的推进,新旧派之间理念上的根本分歧日渐暴露。士绅群体推崇的礼教,目的在于维持既有秩序,强调学生“以入事父兄,出事师长为主要”,“学为奴隶,为斯民应尽之天职”^①。旧士绅坚守的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迫使恽代英努力动员青年学生追求解放、勇于反抗。因为他认为教育要“养成后生的反抗性”,“宁可让学生强健得稍为过火,因为这究竟是生人的性格。我们应该忍受学生强健品行所给我们的不便利”,同时,“我们要使学生对于他所信的,立刻便起来做。我们可以暂时不问他所信的是否正确,我们宁要能实践一个错误主张的人,使他由经验而得改正之,而不愿要一个正确主张的空谈者”^②。受其影响,四川省内许多青年学生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比如曾润百、钱文华、刘元等人留在川南师范,坚持开展中共党团工作,并受命组建国民党泸县临时县党部,响应刘伯承在1926年指挥的泸州起义^③;张霁帆、余泽鸿、穆世济等人则选择追随恽代英,纷纷离开四川,前往上海、广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他们选择加入共产党,并南下参与国民革命。郭沫若曾回忆道:“代英在四川泸县做过师范教育工作,四川的青年受他的影响的,因此也特别多。假使我们从事调查,那时从四川那样的山坳里,远远跑到广东去投靠黄埔军校的一些青年,恐怕十个有九个是受了代英的鼓舞的吧?”^④

值得注意的是,恽代英之前在湖北武昌、安徽宣城等地的教育改革实践与社会改良运动,因为未能得到当地官绅的支持,对他个人而言,施展作为的舞台较为有限^⑤。而当他来到川南师范之后,半年时间即由教务主任升任校长,与此同时,他还成功开展了各项社会教育活动。这场速成的变革,开始确实超出了他的预期。当改革事业正如火如荼开展之时,却因杨森的突然倒台而被迫终止。继任道尹张英明显倾向于传统学说,并得到了保守士绅的认同与支持,道署对恽代英的扣押,激起了学潮,学生的罢课行为又造成旧势力的反弹,增强了他们开除闹事学生、驱逐恽代英出省的决心^⑥。可以说,双方之间的对立情绪使得合作基础彻底崩盘。几经周旋后,恽代英不得不离开泸县。原本被寄予期望的教育改革宣告破产,这对恽代英造成沉重打击,使他对“利用已成势力”完全失去信心,他的思想遂很快由改革过渡到革命。

王奇生注意到,五四之后的三五年间,中国知识界思潮激化的节奏非常快,并认为新文化运动从思想革命转入社会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发展^⑦。恽代英这一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的思路,即:川南师范的改革活动给他带来很高的期望,被迫戛然而止后,失落当中的他从思想上彻底放弃了改良的尝试。正如后来他在刊文中所说的,“若以为我们能整理一下中国诸子百家的哲学,或介绍几部郁根拍格荪的哲学,中国便会好了”,“做了几篇好的文学作品,或者是几件好雕刻,几出好戏剧,中国便会好了,这都是太简单了的理想”,对

①李敖虎《原学结论》,第1a页,李敖虎《声白集初编》。

②恽代英《教育家怎样救国?》,《时报·教育世界》1923年10月18日,第1版。该文未被收录到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的《恽代英全集》当中。

③梁佐华《泸州起义中的党、团活动》,中共泸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泸州起义:纪念泸州起义六十周年》,泸州市印刷厂1986年印刷,第292—297页。

④郭沫若《纪念人民英雄恽代英》,《回忆恽代英》,第180页。

⑤有学者指出,武汉五四运动当中,恽代英因“身份敏感”,“只能在幕后参与和指导武汉学生的反日运动”;之后,在安徽宣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担任教员期间,恽代英处处遭到学监唐石亭的刁难和反对,半年时间即被解聘。详参:马建标《五四时期恽代英国家观念的养成及其救国实践》,《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9页;高瑞麟、姚德旺《长歌怀先烈——恽代英、肖楚女在宣城中学的故事》,《安徽教育》1979年第1期,第17—21页。

⑥《川省之政局与学潮》,《时报》1922年11月14日,第3版。

⑦王奇生《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100页。

比老师辈所从事的整理国故、文学改良以及科玄论战等活动,恽代英的想法已与五四时期相去甚远,而在他看来,更多注目于政治和社会问题,“是急于要解决眼前政治上社会上的种种十分迫切的问题”,“急于要解决眼前一切罪恶的根源”,“我们要认清我们现在要紧的一件事,是要‘救国’”^①。在这种急切的救国心理当中,他不仅成长为革命理论的宣传家,同时作为持枪荷弹的实践者,最终走上轰轰烈烈的武装革命道路。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Southern Sichuan and Yun Daiying’s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Li Z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reform in southern Sichuan in the 1920s was initiated by a group of prominent youths, including Lu Zuofu and Yun Daiying, and immediately became the center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in the southwest. This event was not only important in local history, but also led Yun Daiying’s change from conservative to armed revolu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local gentry, the opponents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was quite open to western knowledge, which helped the spread of the new culture. Nevertheless, as the reform advanced,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philosophy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became obvious, and Yun Daiying attempted to rebel against the rituals promoted by the gentry through student autonomy. Eventually, the change of regime caused the outbreak of the student strike and a strong backlash from the gentry, prompting him to join in the armed revolution.

Key words: Yun Daiying; “New Culture Movement” in southern Sichuan; the old and new gentry; student autonomy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恽代英《教育家怎样救国?》,《时报·教育世界》1923年10月18日,第1版。